

數位時代的親密關係暴力

王珮玲

壹、數位／網路與親密關係暴力

毫無疑問地，我們已經處在數位時代。大多數人的日常離不開網路、智慧型手機、以及社群媒體：食衣住行以及醫療照護逐漸依賴數位科技的協助，每天在社群網絡上滑來滑去地和朋友互通有無、利用功能強大的App進行各種活動，在YouTube上看影音，也用Apple Pay、LINE Pay來付費……，數位科技已經是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夥伴。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公布的調查結果指出，2019年我國12歲以上民眾曾上網率為89.6%，而其中Y世代（24-38歲）上網比率最高，高達99.8%，其次是Z世代（12-23歲）上網率有99.3%，另X世代（39-54歲）的上網率也有96.6%。另智慧型手機的使用更是普遍，扣除掉未滿12歲的兒童與年紀較大的老年人口群，九成五以上的人都擁有智慧型手機；而手機上網族群中

98%以上所從事的活動是社群應用，例如Line、臉書FB等，而每日手機平均上網時間高達約3.5小時（206分鐘）（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也就是說，從青少年到中壯年，絕大部分的人每天都花很長一段時間在網路上，已經無法脫離數位／網路的影響。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數位科技確實給人類帶來過去無法想像的便利與舒適，網路世界也大幅改變人們的互動模式，擴展了各種連結與可能性；但不可諱言，人性也有陰暗的一面，越來越多應用數位科技的新型態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也因應而生，濫用數位科技對於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科技時代的新興案例

隨著數位科技的普及，我們可以在各種媒體平臺上看到各種新興數位性別暴力案例的報導，其中最為普遍的應屬數位

跟蹤、騷擾行為。數位跟蹤騷擾行為使被害人無處可躲，但目前對加害人卻是無法可管，而更令人憂心的是，此等行為可能導致致命危險。例如2017年12月發生在北部地區的一件大學生跟蹤砍殺案就是令人怵目驚心的案例：一位男同學欲追求一位女同學，遭拒絕後，男同學便以打電話、簡訊、臉書、Line……等各種方式持續監看、騷擾、恐嚇被害女同學，偽冒網路買家身分約面交，或變造朋友身分約見面，甚至尾隨埋伏跟蹤，而最後持刀砍殺被害人至重傷。

再例如下面一則應用物聯網科技，施暴者對被害人進行網路跟蹤與遠端操控的新聞報導：

【當智能家居成為家暴「幫凶」】：一個女人打開空調，但說它自己關掉了，而她根本沒碰過空調。另一人說她家前門電子鎖的密碼每天都會變，她搞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還有人告訴家暴幫助熱線說，她聽到門鈴響，但門口根本沒人。她們的故事是家庭暴力案件裡一種新型行為的一部分，這種行為與智能家居技術的崛起有關。聯網門鎖、音箱、溫度調節裝置、燈以及攝像頭被宣傳為給人們提供便利的最新設備，如今它們也被用作騷擾、監視、報復和控制的手段。在《紐約時報》進行的30多次採訪中，家庭暴力受害者、她們的律師、收容所工作人員及急

救人員描述了這類科技是如何成為一種令人擔憂的新工具……其中一位女性是矽谷的醫生，她表示，自己的工程師丈夫「控制溫度，控制燈光，控制音樂」。她說：「虐待關係重點是權力和控制，而他用的是科技。」（紐約時報中文版，2018年6月29日報導）

二、濫用數位科技侵害女性的暴力受到舉世關注

根據聯合國寬帶數位發展委員會（UN Boardband Commission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on Boardband and Gender, 2015）出版的「對婦女與女孩的網路暴力：全世界皆應警覺」（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World—Wide Wake—Up Call）報告中指出，目前發現至少有六種濫用數位科技以侵害女性的手段，包括：駭竊（hacking）、偽冒（impersonation）、監控／跟蹤（surveillance/tracking）、騷擾／濫發（harassment/spamming）、招募引誘（recruitment）、以及惡意散布（malicious distribution）等，並且施暴者經常混合使用這些手段來對付婦女與女孩。歐盟性別平等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針對歐洲28國的調查則進一步指出，15歲以上的女性中，估計至少有十分之一曾遭受過網路性別暴力。而根據美國網路騷

擾的調查資料（Lenhart, Ybarra, Zickuhr, & Price-Feeney, 2016）顯示，最常見的數位暴力（digital violence）與網路跟蹤（cyber harassment and stalking）加害人，就是被害人的前任或現任親密伴侶，包括交往中或已分手／離婚的情侶、同居人或配偶。

透過數位科技與網路社群媒體，雖非實體接觸，不會立即造成肢體直接傷害的危險，但數位科技／網路有其別於真實世界的特質，其所具有的匿名性、隱形以及網路世界的分離想像等，易造成「網路去抑制效應」（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Suler, 2005），極可能促使加害者對被害人的羞辱、騷擾、威脅、恐嚇、報復、監控、跟蹤、駭竊資訊、偽造資訊、惡意散布不實訊息或性私密影像、以及性脅迫……等行為變得更為嚴重與不可預測（Douglas, Harris, & Dragiewicz, 2019; Duerksen & Woodin, 2019; Reed, Tolman, & Ward, 2016）；而這些文字、訊息、影像或行為均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可以24小時隨時發生，任何地點都可以施展，並且大量、立即地複製與散布，難以從網路上移除（Harris & Woodlock, 2018）。因此，對被害者所帶來的恐懼、安全威脅、身心健康與社會功能等各方面的負面影響，恐甚於真實世界中的親密關係暴力，已經引起全球普遍的關注。

貳、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範圍與態樣

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包含數位科技、親密關係以及暴力行為等三個要素，指具親密關係之一方，利用數位科技對另一方施以各式暴力傷害行為。數位科技範疇包含資通訊技術、器材與應用軟體，如電腦、平板、智慧型手機、智能家電、網路服務、物聯網……等；而數位與網路的媒介相當多元，諸如即時通訊FB、IG、Message、Line、Twitter、Skype等，行動電話簡訊、電子郵件、網路聊天室、網路社群媒體、部落格或網誌、照片或影片、電子佈告欄BBS、應用軟體App、線上遊戲……等，而當中許多媒介又同時包含多個類型，且科技的運用也都持續在發展與改變中。傳統上親密關係暴力被視為是施暴者與被害人面對面接觸的一種暴力衝突，過往對暴力行為的理解侷限在實體世界的範疇，但數位科技可能創造、轉化、擴展暴力的新手段與方法，且持續發展中，例如發展監控的app、透過物聯網控制、惡意散布個人資訊（doxxing）或性私密影像、發展羞辱特定人的線上遊戲軟體（Lenhart et al., 2016）……等，因此歐盟性別平等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即指出，至今仍無法對此問題有一致的定義與範圍。

雖然至今仍無法對此問題的範圍有一定的共識，但至目前為止，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態樣大致可歸納下列三種類型：

（一）數位跟蹤／騷擾：例如透過電子郵件、簡訊、行動電話、App、社群媒體等數位科技平臺，對伴侶進行各種騷擾、跟蹤、監控等，或掌握伴侶各式的網路帳號與密碼，隨時監控通訊、交友、行蹤……等。

（二）數位脅迫與控制：例如透過電子郵件、簡訊、行動電話、社群媒體等數位科技平臺，對伴侶進行羞辱、威脅、孤立、處罰、控制等，或散布不實言論、私人資訊、相片或影像，以及透過物聯網等科技設備進行遠端控制……等；或是竊取受害者網路帳號密碼，假冒身分、盜取資訊、散布不實訊息……等，藉以脅迫被害人。

（三）數位性暴力／性脅迫：例如傳送具性意涵之文字、影像或羞辱之訊息，或脅迫對方透過網路視訊展示身體、動作或進行性愛聊天，拍攝裸體或性器官的相片與影像、未經同意錄製性愛影片，展示與傳送性私密影像，以及威脅散布性私密影像（或稱之為「復仇式色情」）……等。

在上述各類型中，**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或稱之為「**未得同意散布性私**

密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NCP）」，由於涉及到嚴重的性暴力與權控，近年來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復仇式色情行為指的是：沒有經過當事人同意，而故意散佈、播送、張貼或以任何方式讓第三人觀覽當事人為性交、裸露性器官等性私密之照片、影像；或持之以要脅被害人（張凱強, 2016）。親密伴侶間拍攝性行為影像並非罕見，然而當情感發生衝突或決裂時，影像的持有者便藉此要求復合、支付贖金，或勒索發生性行為；而網路世界充滿對女體的窺探獵奇心態與厭女情結（Bates, 2017），加害者濫用數位科技快速傳播的特性，對被害人加以威脅、予取予求，甚或真的將影片上傳到社群媒體或色情影音平臺做為報復，對被害人帶來難以抹滅的傷害（Kamal & Newman, 2016）。

參、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特殊性

不論是實體接觸的或是數位的親密關係暴力，對被害人與家庭的身心健康與社會關係都帶來嚴重的影響，但相較於實體的親密關係暴力，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具有下列三個重要的特性，擴大了暴力的手段、範圍與影響：

一、擴大暴力的手段與傷害

數位、網路環境有別於實體的世界，

具有無所不在的可近性與立即性，讓我們可以不受時間與空間距離限制的運用。Suler（2005）認為網路世界具有獨特的去抑制效應，包括產生正向的去抑制效應（benign disinhibition），例如更多的自我揭露、更願意協助他人；以及負向的去抑制效應（toxic disinhibition），例如更容易有衝動、煽動的語言攻擊等；且進一步指出下列六個因素促使個人在網路上的互動行為有別於真實世界，包括：

- （1）匿名性（anonymity），網路世界中隱藏真實身分，無法被人辨識，易使線上發生脫序與反社會行為。
- （2）隱形（invisibility），網路世界為使用者提供一個保護傘，線上文字溝通隱藏了聲音、語調與身體語言，容易有錯誤的表示與解讀。
- （3）異步性（asynchronicity），網路通訊如訊息、公告、郵件大都非即時同步回應，因此加害者可以迴避被害者的反應。
- （4）固相注入（solipsistic introjection），因缺乏各種現實互動的要素，人們在虛擬互動中根據接收到的訊息擅自替對方描繪了一個形象，因此容易以自我的想像與期待創造出對方的特性。
- （5）分離的想像（dissociative imagination），網路的分離空間，缺乏真實的理解，易是個人耽溺於自我幻想。
- 以及（6）弱化位置與自我（minimizing authority），缺乏對對方社會線索（例如職稱、穿著等），降低對權威、身分、權

力的界線，什麼都敢說、都敢做。這六個因素不論對陌生人或熟識者在網路上互動均有影響，但負向的去抑制效應會助長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促使親密關係加害者發生更暴力、氣憤、威脅、仇恨的語言與行為。

因此相較於真實世界中當事人的實際接觸，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至少具有下列三個特殊處（Watkins, Maldonado, & DiLillo, 2018）：第一，由於是透過網路媒介而非面對面的互動，施暴者並未直接看到被害者的感受，也無須顧及被害者的反應，故可能更肆無忌憚地發出各式暴力訊息與惡意攻擊。第二，加害者與被害者面對面的對話，瞬間就消失，但數位訊息與影像可以一再看到與重映，更可以複製、儲存與轉寄，讓更大的群體、甚至社會大眾目睹；因此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可能更形惡化被害人的情緒反應，而非僅限於面對面的傷害。最後，因為施暴者可以隨時、隨地運用數位科技與網路平臺發出訊息，無需深思熟慮即可任意作為，因此加害者可能更衝動，被害者也更有反應性。

二、擴展暴力影響的疆界

澳洲一項大規模針對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the SmartSafe study（Woodlock, 2017），訪談了152位家暴服務工作者與46位曾遭親密伴侶施暴的女孩與婦女，分

析加害人對伴侶進行網路跟蹤與施暴的行為，歸納指出加害人三個主要目的，以及企圖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

（一）對被害人造成無所不在的威脅：

空間界線原本可為被害人帶來安全感，但透過網路、GPS或是app的跟蹤與騷擾，被害人感到加害人無所不在的威脅與監控，致使被害人不敢逃離施暴者，感到無助，或是造成心理上永遠無法脫離暴力脅迫的恐懼。

（二）孤立與排除被害人的支持系統：

加害人透過直接的簡訊、電話或是在社群媒體上對被害人與其親朋好友騷擾，企圖羞辱被害人，或是散布不實訊息；而被害人為躲避而換電話、關閉社群媒體帳號或是不上線，迫使被害人斷絕與外界的聯繫管道，同儕、工作、就學環境之人際社交關係遭破壞，達到加害人企圖孤立與排除被害人支持系統的目的。

（三）處罰及羞辱被害人：

例如加害人錄製被害人的裸照或性愛影像，並威脅公開散布到網路社群媒體，或連結網站給親朋好友觀賞，作為被害人不服從或分手時的威脅手段，以及加害者藉此要脅復合、金錢等價或脅迫與之再發生性行為。此種性暴力與性勒索行為讓被害人感到極

度的恐懼、羞辱、自責與痛苦，可能導致嚴重的憂鬱、創傷等身心症狀，甚至自我傷害。

我國至今涉及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影響的研究非常缺乏，王珮玲（2015）曾對17位受暴婦女進行跟蹤騷擾經驗的訪談，發現施暴者跟蹤騷擾的方法即包括遠端操控—利用設備或通訊裝置監控，例如監看被害人網路使用紀錄等；婦女遭受這些跟蹤行為後，感到恐懼與驚慌，身心健康嚴重耗損，工作與經濟收入遭到破壞，也造成與社會支持網絡的疏離。另有關復仇式色情問題，婦女救援基金會（2017）曾透過網路調查，發現1138位受訪者當中，有4%的受訪者曾經因性私密影像遭到恐嚇，10%的受訪者不管有沒有受到威脅，性私密影像已經被外流或疑似被外流，其中83%的被害人是女性。而當問到性私密影像外流，究竟誰該負起責任？儘管87%的受訪者認為散布者應該負擔責任，但也有高達42%的受訪者認為，被害人也應該為此負責，顯示我們的社會瀰漫著一股「譴責被害人」的氛圍。也因此，在參與調查的性私密影像外流的被害人當中，有24%因為害怕被別人發現而不敢報案；再者，該調查也指出多數被害人有羞愧、害怕被人發現、恐懼、自責、懊悔、憤怒等反應，且51%有自傷／自殺意念，3%有實際自傷行為，以及1%有實際自殺行為出現。

三、深化性別、年齡、身分、地域等差異的影響

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的狀況與影響雖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但並非是劃一的現象，必須細究當事人的個人特性因素與所處位置，方能更理解暴力現象的差異，以及帶來的不同影響。性別、年齡、身分（例如新移民、身心障礙者）、所在位置（例如偏遠村落或山區）等因素，在親密關係暴力議題中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變項，而在數位時代，這些因素的差異影響，恐更形重要。「性別」在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中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以權控理論的觀點而言，親密關係暴力被視為是男性企圖掌控女性的性別暴力（Johnson, 2006; Stark, 2006）。在數位科技時代，科技親近性本身就存有性別差異，再加上網路世界中「厭女文化」（misogyny）的散播（Dragiewicz et al., 2018），因此，運用科技與在網路社群媒體上的操控與威脅，將更鞏固親密關係暴力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以及更形惡化男性對女性的宰制與掌控。

再者，年輕族群是網路上最活躍的一群人，青少年與大學生也是發生數位親密關係暴力比例最高者（Brown & Hegarty, 2018），也就是說，青少年與大學生恐是最大一群的加害者與受害者。除此之外，一份新近發表的澳洲調查資料指出，施暴

者透過限制接觸網路與掌握科技的使用，對於原本已處於孤立處境而需透過網路與家人、朋友接觸的新移民婦女而言，將陷於更為斷絕與被控制的情境；同樣地，身心障礙或處於偏遠地區的婦女，極度依賴網路通訊以對外聯繫、獲取資源及與社區連結，但若加害者掌控科技的接觸或是運用科技進行監控，無疑更增加了婦女的社會排除以及危險性（Woodlock, McKenzie, Western, & Harris, 2019）。

肆、防治政策與服務

數位科技遭濫用於性別暴力，是一個跨疆域的國際重要議題，聯合國2017年針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提出「關於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最新的第35號一般性建議，其中第20點特別指出有關網路或數位環境下的暴力行為：「基於性別的暴力侵害婦女行為存在於人際接觸的所有空間和領域，無論是公共場所還是私人場所，包括家庭、社區、公共空間、工作場所、娛樂、政治、體育、健康服務和教育環境，以及根據以技術為媒介的環境重新界定的公共和私人場所，例如當下在網路或其他數位環境中發生的暴力行為。」並要求各締約國在預防、保護、起訴和懲罰、補救、數據收集與監測和國際合作領域採取各項措施，以回應此一新興問題。

數位科技與親密關係暴力的結合，已超乎目前相關回應法律制定時的想像與範疇，各國目前是急起直追，紛紛開始進行研究，並推動回應的政策、法律與服務方案，且紛紛將濫用數位科技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影響列入國家防治工作重點之一。例如英國2016-2020年的國家對於消弭婦女及女童暴力整體行動策略報告（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Strategy 2016-2020），即提出必須採取行動預防數位暴力與剝削，包括針對復仇式色情被害人從網站上刪除圖像權給予建議和支持，並且探索和採用新技術來支持受害者，例如推動手機應用發展，以幫助被強迫婚姻和跟蹤的受害者。又如，澳洲制訂的12年「2010-2022年減少對婦女與兒童暴力國家計畫」（National Plan to Redu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 2010-2022）行動框架（Council of Australia Government, 2010）也特別採取多項行動來回應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包括發展網絡即時諮詢與線上交談、研發反制監控的設備與措施，協助被害人記錄證據等。

除此之外，針對特殊的數位親密性暴力行為，尤其是復仇式色情案件，一些國家最強有力的回應政策就是制定相關法律，將此類行為犯罪化，處以刑罰，以及規範將照片、影像予以移除。例如法國於2016年制定「數位公共法」（Digital

Republic Law），對在網路上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的加害者處以二年徒刑，或是六萬歐元的罰元；英國則是更早在2015年4月即制定類似的法律，違法者最高可以處二年的徒刑（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

而有關服務策略部分，可能是普遍對此社會新興問題的陌生，研究者檢視相關資料，難以發現具體的服務策略或模式。唯歐盟的報告指出，英國在2009年已設置「國家網路跟蹤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Cyber-stalking Research），投入資源對網路跟蹤／騷擾行為的發生率、動機、影響以及危險評估等議題深入研究；2015年起，該中心開始投入復仇式色情的研究，並設立服務專線，在半年內即收到約二千件的諮詢案件（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另外，斯洛維尼亞（Slovenia）政府也在2017年六月制定CYBERVAW方案，大力推動民眾的教育，提升學生及社會大眾對數位性別暴力的認知，預防濫用數位科技對婦女與女孩暴力案件的發生（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

反觀我國，至目前為止尚未見到對數位性別暴力議題有具體的政策回應，但民間團體大力呼籲政府應重視此些行為的危害性，遂積極推動「跟蹤騷擾防制法（註1）」以及「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註2）」草案的立法，希望能提供被

害人更立即的安全保障以及更周延的權益維護，但目前該二草案均尚未立法通過。除此之外，目前國內相關資料蒐集與研究均極有限，更遑論服務方案的提供。

伍、結語

數位親密關係暴力是一個重要的新興議題，國際上無論是政策回應或是學術研究討論，目前都剛起步，而我國對此議題的探究則更是匱乏；因此，未來除了應持續進行大眾之宣導與教育外，就防治政策與服務面向應就下列幾個方向積極推動：一、將濫用數位科技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影響，列入國家防治工作重點之一，跨部會合作制定行動策略。二、正視數位科技助長親密關係暴力現象，積極投入資源進行

相關研究與調查，掌握問題內涵與影響範圍。三、大力推動相關教育訓練，提升相關網絡人員包括社政、警政、教育、衛生、司法、傳播等專業人員對此議題的認知與回應能力。四、研議發展相關防制策略與被害人服務協助措施，且應含括科技應用、網路犯罪、大傳媒體等領域，發展網路上的管理與反制策略等。以及五、盡速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及「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之立法，以有效遏止相關犯行，保障被害人權益。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兼家庭暴力研究中心主任）

關鍵詞：數位科技、數位親密關係暴力、數位跟蹤騷擾、復仇式色情

📖 註 釋

註1：依據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第15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已由立法委員於106年12月29日提案交付審查。

註2：依據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4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性隱私影像侵害犯罪防制條例」草案已由立法委員於107年5月25日提案交付審查，提案理由說明為：鑑於社會型態改變，惡意揭露性隱私影像之行為益趨氾濫，又網際網路複製便利與傳播快速等特性，對被害人之名譽、隱私及性自主權造成重大侵害，亟需訂立專責法律，以收其效。

📖 參考文獻

王珮玲（2015）。〈如影隨形的暴力：親密伴侶跟蹤行為〉，《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9

(1)，頁1-44。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2019年台灣網路報告》。

婦女救援基金會（2017）。〈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以性私密影像外流為核心〉。「數位時代中的性別暴力——以性私密影像外流為核心國際研討會」。2017/10/20。

張凱強（2016）。《散布性私密影響行為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107年持有手機民眾數位調查報告》。

〈當智能家居成為家暴「幫兇」〉，<https://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80629/smart-home-devices-domestic-abuse/zh-hant/>。《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06/29。2020/03/28作者讀取。

Bates, S. (2017). Revenge porn and mental healt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mental health effects of revenge porn on female survivors. *Feminist criminology*, 12(1), 22-42.

Brown, C., & Hegarty, K. (2018). Digital dating abuse measures: A critical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40, 44-59.

Douglas, H. Harris, B. A., & Dragiewicz, M. (2019). Technology-facilitated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Women's experienc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9(3), 551-570.

Dragiewicz, M., Burgess, J., Matamoros-Feranadez, A., Salter, M., Suzor, N. P., Woodlock, D., & Harris, B. (2018). Technology facilitated coercive control: Domestic violence and the competing roles of digital media platforms.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8(4), 609-625.

Duerksen, K. N., & Woodin, E. M. (2019). Cyber dating abuse victimization: Links with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0(0).

European Institute for Gender Equality. (2017). 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Harris, B. A., & Woodlock, D. (2018). Digital coercive control: Insights from two landmark domestic violence stud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59(3), 530-550.

Johnson, M. P. (2006). Conflict and control: Gender symmetry and asymmetry in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11), 1003-1018.

Kamal, M., & Newman, W. J. (2016). Revenge pornography: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and related legisl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sychiatry and the law online*, 44(3), 359-367.

Lenhart, A., Ybarra, M., Zickuhr, K., & Price-Feeney, M. (2016). Online harassment, digital abuse, and cyberstalking in America.

Reed, L. A., Tolman, R. M., & Ward, L. M. (2016). Snooping and sexting: Digital media as a context for dating aggression and ab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2(13), 1556-1576.

Stark, E. (2006). Commentary on Johnson's "Conflict and control: Gender symmetry and asymmetry in domestic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2(11), 1019-1025.

- Suler, J. (2005).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analytic studies*, 2, 184-188.
- UN Boardband Commission for Digital Development Working Group on Boardband and Gender. (2015). *Cyb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A world-wide wake-up call*.
- Watkins, L. E., Maldonado, R. C., & DiLillo, D. (2018). The cyber aggression in relationships scale: A new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technology-based intimate partner aggression. *Assessment*, 25(5), 608-626.
- Woodlock, D. (2017).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i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talk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3, 584-602.
- Woodlock, D., McKenzie, M., Western, D., & Harris, B. (2019). Technology as a weapon in domestic violence: Responding to digital coercive control. *Australian social work*.